

“文艺学何为”^{*}

——关于“文艺学与社会”的对话

○ 厦门大学中文系及艺术教育学院部分教师

林兴宅（主持人）：近来南京大学的周宪教授提出了一个“文艺学何为”的问题，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反映了我们这些从事文艺学教学与研究的人深沉的焦虑与困惑。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个领域都发生巨大的变化，文艺理论和批评不再像从前那样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那样受人关注，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边缘化”。因此，有些同志感到不适应，不理解。尤其 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浪潮汹涌而来，社会价值观念更向实用主义偏转，文艺学的社会地位每况愈下。正如有人说的那样，我们搞的这行当领导不重视，社会不关心，作家不买帐，学生不愿听。由此人们怀疑起文艺学有没有用，我们能做些什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冷静地想想，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处在中心地位。以前强调文艺要为阶级斗争服务，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似乎能呼风唤雨，受领导青睐，万众瞩目，以为自己处在社会生活的中心，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现

在，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了，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文艺学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心。所谓边缘化其实是文艺学摆脱“中心化”错觉，回归本位的表现。迷恋甚至试图回到以前那种所谓“中心”是不可取的，简单地提“文艺学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市场经济服务”恐怕也不能解决问题，现实的情况是，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意识形态功能开始弱化，而它又无法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直接的效益。这就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文艺学的价值定位问题，要回答文艺学在社会生产中能产生些什么作用，也就是“文艺学何为”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围绕“文艺学与社会”的问题进行一次讨论。

一、文艺学如何参与社会变革的进程

黄鸣奋：关于“文艺学何为”的问题，其实很早就有人注意到了。我记得 1992 年在厦大开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年会的时候，中南民族学院的申建中博士便提出了

类似的问题。他当时在大会发问：“古代文论有什么用？价值在哪里？”从那时到现在，这个问题看来是越来越迫切了。我想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否有这样一个背景：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于是文艺学与社会的关系也就不成其为问题。到后来，经济建设成了我们国家的工作中心，大家才觉得这种提法不妥，因为文艺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样，文艺学就进入了一种以考虑自身演化与建构为主的自语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谈到文艺学的重新建构问题，或希望将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加以现代转型以解决当前文艺学的“失语”，或希望移植西方话语来建构中国文艺学。但是我想，这个问题还必须注意另一方面：文艺始终立足于社会，文艺学也始终立足于社会。社会变革提出了一些很实际的问题，迫切需要文艺学加以解决。前些日子，我去北京参加通俗文艺研讨会，与会的基本上是作家，搞理论的人甚少。这些作家感到遗憾的是，他们的创作缺少批评，缺少来自文艺理论界的声音。而我们这边呢？却恰恰是理论脱离了创作。我们在教学中，动辄以古典名著为例。这些例子，当然有其经典意义上的价值，但是生活已经给我们的创作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说文艺学要面向社会，参与社会变革进程，这就是重要的背景。社会才是文艺学的土壤，自言自语难免导致失衡。“文艺学何为”本来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但现在却堂而皇之地摆在了我们面前，我想，该到反省一下文艺学自身的价值定位是否准确的问题了。

杨春时：过去文学理论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还负担着指导文学创作的责任。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意识形态斗争的作用弱化，指导文学创作的功能也弱化了。很少有作家遵循文学理论创作，倒是理论家跟着文学创作来重新调整理论体系。这样看来，文学理论似乎没有什么用了。我认为文学理论仍然有用，因为它是一门学术，有独

立的学术价值。所谓学术价值，就是与实用价值不同的知识学意义，它满足着人类的求知欲，这也是一种人文精神，在这个意义上，“为学术而学术”有一定的道理。文学理论虽然实用价值（包括意识形态功能和指导文学创作的作用）减弱了，但学术价值反而突出了，这是文学理论复归本位。在以往年代里，文学理论牺牲了学术价值，服务于意识形态斗争，不能算作正常状态。现在文学理论突显学术性，日益专门化，真正成为一门学问，一门学术。它的作用就在于对历史上和当代的文学活动作知识学立场上的解释，这正是文学理论的真正本质。总之，要变意识形态化的文艺学为学术化的文艺学。

王 诺：刚才黄、杨两位教授分别从社会角度与学术角度对这一问题提出看法，他们的观点我都赞成。不过，我想我们也许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今后，我认为我们的文艺批评家主要应在中心之外，对体制、社会及社会上的种种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思想性与批判性应成为今后文艺学努力的方向。文艺学家应该对人、社会和世界作哲理的思考和理性的阐释，而不仅是对作品加以阐释。文艺学应该成为思想家与社会批判家。对于他而言，作品只是他切入社会的媒介，他以此阐释自己对世界的认识，这与作家利用素材来表现他对世界的理解是一样的。作品来源于现实，文艺学家和批评家不仅仅是“反映的反映”，还必须关注社会。康德所说的那种“批判的时代”并没有终结。没有独立且深刻之思想成不了大理论家，不关注社会现实躲入纯文本之内同样成不了大理论家。卢卡契说：促使作家走向虚无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物化社会最隐蔽又是恐怖的防卫机制，同样，促使文艺学局限于文学“内在研究”也是物化社会的隐蔽且恐怖的防卫机制。当代哲学家约翰·卢克说得好：“正是这种批判精神，即理性的趋势，在对一切问题进行大无畏批判的同

时，为自主权奠定了基础。”正是文艺学的批判理性奠定了它存在的一个根本基础。

陈世雄：我赞成杨老师的意见，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有它独立的存在价值的。认为文艺学不再是文学的附庸，而是一门有独创性的、独立的学科，这种看法至少在50年代就由弗莱提了出来。但独立不等于脱离社会。有的同志认为当前以经济为中心，我们搞文艺学的成了“边缘人”。我不赞成这种看法。除了物质文明建设，不是还有精神文明建设吗？文艺学研究应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起一定作用。正如黄老师所说，现在的问题是：文艺学离实际太远了。中国应该有一批联系现实的文艺理论家。过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不过读了一封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就被沙皇宣判了死刑。可见别林斯基作为一个文艺理论、批评家，是多么关注俄罗斯文学的现状，他的意见是多么切中文坛的要害！文艺学的理论建设，和文学批评的实际是分不开的。别林斯基如果不是一个大批评家，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大理论家。现在我们的文艺学，不光对作家的创作影响不大，对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也不大。翻开报刊，有哪几位批评家是先研究了文艺学书里说的“批评方法”，再来写评论的？当前的文艺批评风气不好，只说好话，肉麻吹捧。我接触戏剧界多一些。搞戏剧批评的当面只能说好，不敢说坏。一出戏辛辛苦苦搞出来，是要去全省、全国参加评奖，拿奖项的。能不能拿到奖项，关系到对本地文化领导部门的政绩如何评价，甚至关系到对本届政府的政绩如何评价。你说这出戏不好，就有可能得罪领导，于是一片叫好声。翻开报纸，大多是这种庸俗的批评。对这种现象，文艺学家们要加以思考、研究，不能只是研究“批评方法”。文艺学是理论形态的东西，它不是文艺批评本身，但是，要以文艺学独特的方式对文艺创作和批评产生应有的影响。

易中天：今天讲文艺学与社会的关系，问文艺学有什么用。要我说，没用。当然，要说它有用也有用。有什么用呢？有三个：一、满足人类文化需求。这问题其实和问其他学科有什么用是一样的。简单地说，就是给文学一个说法。人活着，就要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这三个问题。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对文学也要这样问。文艺学就是对此所作的解答。二、提供一套包括欣赏与创作的方法。这个方法提出来后，只是仅供参考而已，它不存在指导意义。以前我们把文艺学的作用抬得太高了，好像“一言可以兴邦”。没有那么大的作用。它只是因为人类有了文学创作活动，就要提供一整套方法。刚才陈先生说到现在批评都成了商业炒作，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习惯于不从文学的角度进行批评，而习惯于从社会的角度进行批评。现在很需要一种文学批评，趣味批评。三、满足个人学术兴趣。就是说，我就喜欢文艺学，我就是要琢磨它。想弄清文学这玩意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此而已。所以，我不主张文艺学对社会起多大作用，我说文艺学是没有用的，原因就在这。那么，搞文艺学的人怎么办？我看有两条出路：一是失业；二是转行。我们国家的文艺学队伍中有半数该失业。首先，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多人。其次，现有的人也未必合格。我在我的一个中篇小说《文火慢熬》的创作谈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积我多年从事文艺理论教学研究的经验，深知中国的文艺理论是既无文艺，也无理论。”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文艺理论队伍中，确确实实有一半人既无文艺，也无理论。以前我们的文艺理论确如前面几位所言，是阶级斗争工具，甚至只不过是帽子、棍子和尺子。做这样的事，是不需要懂文学，也不需要懂理论的。如果这部分人到今天还停留在这种水平上的话，活该失业。那么另一部分人，也就是各位刚才谈到的，要做这个做那个的文艺理论

家，我个人认为，都属于广义的转行。最后剩下一小部分人就像陈景润做哥德巴赫猜想那样，去做文艺学中最艰深、最本质的东西，这很崇高，那也用不着抱怨文艺学变成了边缘。对于一部分认为自己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有种社会责任感的人，我个人认为可以调整自己的位置，就是可以不限于文艺学或用文艺学做别的事。当然，你可以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介入生活，表达人对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但我还可以不客气地说，不要对这种参与社会进程的方式抱太大希望。读作品的人尚且不多，读批评的人就更少了。更何况，我们的文艺批评如陈先生所言，已经自己坏了自己的名声，谁还会去看？所以，一部分文艺批评者可以转向社会批评。另外文艺批评如果还想发挥一点影响，就必须改变文艺学的研究方式和文风。你如果还是那样一张说教的面孔，写得像高等学校的讲义教材一样，肯定没人看。

林兴宅：刚才的讨论实际上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个是学术价值的层面，二是社会价值层面。文艺学有没有用？易中天教授认为没用。这是从功利的角度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学理这一角度看，文艺学的存在就说明它有用。在世俗生活中，很多人不关心文艺学，甚至连大学生也不太愿意听文艺理论课。这是现实，连我们自己搞文艺学的，也对其价值发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学是否没有价值没有出路了呢？对此，我和易教授有些分歧，文艺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有它的存在价值，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它的价值？我认为，文艺学有三种价值取向，一是学术价值取向，即为知识的传承、学术的发展做出贡献；二是思想价值的取向，即文艺学研究为社会提供思想资源、融入思想史的发展之中；三是社会价值取向，即为社会提供某种服务，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杨春时教授偏重于从学术价值这一取向来谈，王诺老师和陈世雄老师偏重于从

思想价值的取向来谈。文艺学除了上述两种取向，还有第三种价值取向。我觉得文艺学研究还要有现实关怀，我们文艺理论工作者也要有现实关怀。也就是说，文艺理论工作者应该以他特有的方式为现实社会服务。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给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些是要政治家来回答，有些是要经济学家来回答……，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文艺学家来回答。比如，人文精神的构建问题，比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应该走什么路，作何调整的问题，又如在媒体革命，信息社会到来的今天，文艺学应该如何应对的问题等等，像这些问题都是现实问题。因此，我觉得文艺学还应有现实关怀，还要不断回答现实中提出的、理应由文艺学家回答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提出“文艺学如何参与社会变革进程”的问题，就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是不是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或者说没有必要呢？在这个问题上，我和易教授的观点不太相同。我们不能完全游离于社会变革之外去做纯粹的学问。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可说是灾难深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在探讨我们这个民族的振兴与出路问题，作为文艺学家能回避这一问题吗？我认为作为一名知识分子，都要有现实关怀，也都可以在现实的变革中做出贡献，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我们的作用比起其他方面的专家也许要微薄得多，但是还是可以有作为的。可以用特有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的进程，为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一点，学院派知识分子，尤其我们这些文艺学的教师意识比较薄弱。中国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世界的问题也实在太多了，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解决，所以，我们在考虑文艺学有什么用时，不妨增加这一维度。

易中天：林先生刚才提的很多观点是非文艺学的。而且林先生刚才提出的两个问题，文艺学如何参与社会变革进程，如何应

对信息社会的挑战，更多的是实践问题，而非理论问题。理论解决不解决不要紧，实践最终会加以解决。走向市场的问题，就如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十六字方针第一个即是“产权明晰”，产权不明晰，还搞什么企业？但这是中国国情。文艺学之所以会有走向市场的问题，就在于原来有很多刊物是国家掏钱养着，国家不掏钱养，这不就解决了？

朱水涌：文艺学之所以有从中心走向边缘的失落，之所以有如何走向市场的困惑，关键还是对文艺学的根本问题没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一个学科之所以能够存在，自有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特殊价值，尤其在今天这个越来越趋向高度综合化同时又高度专业化的时代，文艺学学科的存在，不仅在于它所提出的解决的问题是其它学科难以综合“吞并”掉的，而且它还要有综合其它学科的潜力。长期以来，文艺学有一种越轨行为，承担了过于沉重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社会关怀与文化关怀搅合在一起，因此在“五·四”启蒙时期，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开展之际，它便成了思想先锋，可以处于中心位置上为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经济呼风唤雨，但这也带来了文艺学自身建构的千疮百孔，一直无法冷静地走出一条建构独立学科的路子。也正是这个原因，当社会发生变化，现实的社会使命和政治使命不需要文艺和文艺学再来充当前卫时，它便困惑、便有了失落感。我并不认为文艺和文艺学可以脱离社会、政治和其它意识形态领域而存在，但文艺和文艺学存在的合理性，却在于它是以其独特的精神关怀和社会象征行为，来实现其社会关怀和其它关注的。仅就文艺研究而言，文艺批评、文艺理论和文艺史构成一个三足鼎立之势，整体格局保持了一种相互独立相互渗透的稳定的“三角关系”，其中的文艺理论是属于文艺学的。文艺理论是以文艺史提供的丰富成果和文艺批评总结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全面地研究、概

括和阐明文学的性质、特点、基本规律的原理，但它是超越于创作和史料之上的理论架构，它追求理论的形而上和对文艺史、文艺批评的指导价值。所以文艺学要善于在文艺史和文艺批评中提出新命题，解决新命题，尤其是提供那些其它意识形态领域难以提供无法提供的人类审美命题。如果能这样，从事文艺理论的研究者就完全没必要为文艺学忧心忡忡。这里，我以为有下面几个方面是文艺理论研究很特殊的地方，是它与社会的关系的独特性所在：一、研究和解决个人与生存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原理，这是从文艺的想象特征出发的，也是为了纠正过去文艺理论将文艺仅仅作为社会载体的理论抽象；二、研究和解决文艺为什么会经常地预见到政治的、哲学的和伦理学的意识形态因素，这里要解决的是文艺不是从原有的意识形态系统来获取社会的意识的内容，而是如何直接地从生存经验、从认知时代精神风貌以及其它意识形成过程本身来取得它们，这是文艺独立性的根本所在，也是文艺之所以具有超越时代、超越空间的真谛；三、研究和解决文艺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特征和规律，这是对文艺为何最容易折射现实的初生状态却又不是现实的直接呈现的探索；四、研究和解决文艺是以什么样的精神和形式来实现它自身的社会关注，这也是文艺审美性的重要问题。倘若能从原理、规律和方法上解决文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文艺与文艺学也就不至于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躁动不安了。

黄鸣奋：我对文艺学价值问题的看法，与易先生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哥德巴赫猜想属于数论研究，数论研究乍看起来是最冷门的，但是在现代计算机设计中，却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它与密码设计有关，而密码设计又是现代电子商务发展的关键。也就是说，有些学科的价值并不像我们初看上去的那么简单。看文艺学的价值也许要从另一个角度，换个方式去理解。刚才朱老师说

了，文艺学包括文艺批评、文艺史论和文艺理论这三块。从这三方面来理解，我们文艺学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比如说文艺如何进入商品流通，与流通结合后文艺会发生哪些变化，这一重大命题在国外至迟 80 年代就已经在研究了，叫做文艺经济学。还有教育部今年在振兴计划中提到的艺术教育问题，也需要我们用理论来指导。关于文学史论，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目前存储技术发展很快，资料保存得太多了，鱼龙混杂，对于后人理解我们这个时代造成了很多困难。过去文艺作品是自然淘汰，现在则不同了，什么作品都能往下流传。这就需要我们文艺史家去做工作，而这工作没有理论指导是不行的，它必须建立一个标准。至于文艺批评呢，我同意陈老师的观点，要反对将批评庸俗化。批评变为工业化炒作当然是不行的。但是批评里面其实还有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必须防止与现实生活疏远化。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但首先是得为文艺学找到一个合理的地位。文艺学本来就不是中心，不能把它定得太高，不要把它的作用看得太绝对了，很多事情只要我们去做了，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就行了。

俞兆平：对于这个问题我没多大兴趣。因为我觉得经过文艺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样一种偏离，再经过经济浪潮的冲击的第二次偏离，文艺学该到了自我特质确立的时候，到了自我定位的时候了。到 20 世纪末，到两大浪潮冲击后的今天，大家还在反诘，还在寻找定位，还在讨论问题，我觉得有点悲哀，觉得没太大必要。我这个人大概染上点古典主义者的情味，还相信有神圣的东西存在。只要有文艺活动存在，对它进行理性概括的文艺学就一定存在，它价值就一定会显现。从这一视角出发，就无所谓什么中心或边缘化。它只作为一门学科的价值而存在。人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特殊的族类站立在世界上，就在于他时时把感性具体升华为抽象概念，把现象升华为学理，这就是人文精神价值所在，这就是古典主义者的思想。

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我认为文学艺术不会被取代掉，被否定掉，就像马克思在《手稿》里面说的那样，人要全面发展，把自己全部的本质力量都释放出来，经对象化而确证。视觉有视觉的对象，听觉有听觉的对象，第六感官有第六感官的对象。人既然创造了这么多感性具体的美的存在，也肯定会站在理性的高度予以总结、概括，这个就是文学艺术价值所在，这是不可动摇的，除非将文艺学这些人类生存的感性状态取消。在文艺学中，有三个层面，一是具体文艺批评，一是文艺理论史的叙述，一是纯学理性的理论概括。不要把这三个层面都搅和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态度，“我”就是充满自信的“我”，我不管外面怎么变。我比较欣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文艺学的学科特点决定它有独立自存的价值，那么你就得把学科本身先建构好。我比较同意春时的观点，一门学科可以作为纯学术价值而存在。如果说我们要跟着社会跑，跟着经济浪潮跑，那么中文系的不少课程就不要上了。有些学科的实际应用价值确实不大，但其纯理论价值却是存在的，而且这种纯理论价值很难说什么时候会显露出来。就像刚才鸣奋说的，陈景润的数论到了计算机时代，它的价值就冒出来了。精神形态的东西更微妙。在整个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它会回过头来需求精神性的东西，也就需要这方面的深度探索。基佐在《法国文明史》中说：“一项重大的社会改良，一项巨大的物质福利上的进步，如果不伴随着智力发展和精神上相应的进步的话，这种社会改良就会显得是不牢靠的、无法理解的、几乎是不合理的了。”我们现在把文艺学这门学科在本体上实实在在地建构好，就是对人类精神领域的完善，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文艺学何为”是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宪教授 1999 年 5 月在中外文论学会同南京师大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的发言题目。这里是就这一话题展开我们的讨论。